
人地矛盾与当代浙江文化精神

陈立旭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对于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浙江人何以具有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本文认为，计划经济的边缘地位、体制外社会群体庞大从而使浙江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等因素，显然是上述文化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也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精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关键词：浙江 人地矛盾 自主谋生 自主创新 文化精神

作者陈立旭，男，1963年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杭州 310012）

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意识，是当代浙江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浙江人对改善自身生存和社会生活条件，较少地依赖于政府和行政长官，而更多地诉诸于个人努力与社会个体间的协作；浙江外出经商务工者众，但浙江人在外不当打工族，绝大多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是或大或小的老板族，这些现象都体现了浙江人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精神。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专业市场的兴起，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崛起、全国各地“浙江村”、“浙江街”、“温州村”的形成、自筹资金建设城镇（“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是典型代表）、旧城改造资金自我平衡，乃至台州温岭等地的民主恳谈会等，也都更充分地显示了浙江民间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精神。浙江人何以具有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本文试图从人地矛盾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对浙江人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精神形成原因的分析，显然应当贯彻马克思·韦伯所谓多因素的“弹性”解释原则。计划经济的边缘地位、体制外社会群体庞大从而使浙江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等因素，显然是上述文化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也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精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在中外历史上，因人多地少或土地贫瘠，而使当地人萌生到非农领域谋生意愿并形成一种商业文化传统，有众多的事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中国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山西。

威尼斯商人善于经商、萌生到非农领域之外谋生的强烈意愿并形成一种特有的商业文化传统，与其说是天生的，到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的。威尼斯远离欧洲大陆，土地贫瘠，没有像样的陆地、甚至没有像样的岛屿，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沼泽之中，无土地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应该是它的不幸。但是，正是这种不幸，反而为威尼斯提供了某种机遇。一方面，土地贫瘠对威尼斯构成了一种限制，然而它在地理位置上恰恰又位于西欧大陆文明和东部拜占庭文明的中间，成为中部欧洲与地中海各国间自然的联络站。这种天赐的地理位置，正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商机。因此，“商业最重要的中心是在意大利：罗马时代城市传统的存留，半岛某些地区与君士坦丁堡东部帝国的持续联系，以及它在地中海东部的地理位置，使它自然成为大规模商业复兴的地点。位于亚德里亚海上的威尼斯，地理环境优越，使它可以利用商业的各种机会。”^①贫瘠的土地使威尼斯人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使他们萌生了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这种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使威尼斯人不仅突破了贫瘠的土地的束缚，也突破了中世纪坚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限制，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商业文化传统。只要有利可图，不管是基督教的朋友还是基督教的敌人，对威尼斯人而言，都无关紧要。威

尼斯人的“进取和寻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对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会遭教会的谴责，而且会背上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②在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进取精神的激发下，威尼斯商人除了同异教世界进行正常的贸易以外，甚至还突破欧洲的禁令，贩运武器原料给回教徒，以谋取利润。

像威尼斯商人一样，明清时期的徽商和晋商到非农领域之外谋生的强烈意愿和进取精神，特殊的自然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关于徽州自然环境与徽商群体兴起的联系，明清的学者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吴日法在《徽商便览》中说，“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山川崎岖，冈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③唐顺之也认为，“新安土地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闾閻家不憚为贾。”^④据统计，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仅2.2亩，清代康熙年间为1.9亩，道光年间则进一步减少到了1.5亩。按现在的标准，无论是人均耕地面积2.2亩，还是1.9亩、1.5亩，都不算太少的数目，但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徽州的人地矛盾就非常突出。据乾隆年间徽州学者洪亮吉所说，当时“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既须四十亩矣。”^⑤也就是说，人均4亩耕地才能解决当时人的温饱问题。按照这个标准，明清时期的徽州显然是一个严重缺粮的地区，顾炎武因此说，徽郡“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⑥徽州人许承尧也说，“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⑦土地难以糊口，无疑激发了徽州人到非农领域之外谋生的强烈意愿和进取精神。《歙志·货殖》认为，俗谚将“经商(贾)”称为“生意”，即源于此，“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提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⑧

像徽商一样，明清时期的晋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也与“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的自然环境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山西地处内陆，海拔高，地形崎岖，岭谷相间。农业耕地以旱地为主，水地面积很少。明清时期无耕地分类记载，据1935年的调查，全省耕地中旱地占97.18%，水地仅2.82%，而旱地中有48.51%是山坡地。^⑨平原洼地土地碱化，高阶台地水源短缺，黄土丘陵则有水土流失之虞。贫瘠的土地，导致明清时期山西粮食亩产量偏低。清人任启运说：“自直隶北境及山西，大抵土广而人稀，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⑩因此，山西缺粮严重，清人朱轼说：“查山、陕二省地瘠民稠，即丰年亦不足本省食用，全凭东南各省米艘，由江淮溯河而北，聚集豫省之河南、怀庆二府，由怀庆之清化镇太行山运入山西，由河南府之三门砥柱运入潼关，晋省民人，籍以糊口，由来已久。”¹¹如威尼斯和徽州一样，山西的土地养活不了人，由此也激发了山西人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正如清人康基田所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数年不归，非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迁贸有无，取给他乡。”¹²据调查，清末民初山西祁县的总户数中，60%以上的家庭有过经商史。按此推算，一个10万人的县，便有1.5万人外出经商。¹³民国《太谷志》亦云，“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后，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谋善生，跋涉数千里率不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¹⁴山西太谷县原先地瘠民贫，但穷则思变，在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作用下，太谷县逐渐地由贫入富。道光后，太谷为山西三帮票号之一，富甲一方，已“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¹⁵

不仅仅威尼斯商人、徽商和晋商的兴起，而且历史上多数商帮的兴起，都与人多地少或土地贫瘠的自然环境具有一种联系。历史上多数商帮的故乡都是地狭人稠，以至民众难以单纯依靠农耕为生，不得不另谋他路。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特殊的自然环境虽然是商帮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却不是充分的条件。否则就不能解释，同样是地狭人稠之地，为什么有的地方形成了商帮，另外的地方却没有，有的地方的百姓萌生了到农业之外谋生的意愿和进取精神，而另外地方的百姓则仍安于现状。因此，在重视自然环境与人们自主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以及商帮兴起的联系的同时，一种综合的考察仍然是必要的。正如唐力行所说，对徽商现象的研究，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地理与民生的关系，还应深入考察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即便就地理而言，除了要注意到徽州内在的多山，还要从宏观上把握徽州在江南所处的位置。还应注意社会的互动，徽商的勃兴，正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互动的结果。¹⁶唐力行的这一观点，不仅对于研究徽商现象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其他商帮现象也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二

改革开放以来,像中外历史上的威尼斯、徽州、山西一样,浙江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也是浙江人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浙江全省陆地面积 10.18 万平方公里,为全国面积的 1.06%,是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其中,山地和丘陵占 70.4%,平原和盆地占 23.2%,耕地面积 161.38 万公顷,河流和湖泊占 6.4%,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各省市的“人均资源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 100,浙江省的具体数值是:水资源 89.6,能源 0.5,矿产 4.9,可利用土地 40,耕地和气候 117.2;各省市的“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浙江居倒数第三位,末五位分别是:上海 10.4,天津 10.6,浙江 11.5,江苏和广东均为 26。研究报告表明,就基本自然资源的丰度而言,浙江确实是一个“资源小省”。在“人均资源量指数”中,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显得尤其突出。1993 年,浙江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423.7 人,比同期全国平均 123 人和世界平均的 41 人高出许多倍。1978 年浙江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0.68 亩,1990 年为 0.615 亩,到了 1995 年为 0.57 亩,现在已进一步下降到 0.55 亩。浙江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6。在浙江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在作为浙江模式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台州和温州地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水平则更低。1978 年,温州地区人均耕地为 0.52 亩,永嘉的桥头镇,人均耕地面积仅有 0.28 亩。目前,温州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33 亩,只有全省的三分之二。而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台州,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 0.5 亩,远远低于当时全国 1.6 亩和全省 0.68 亩的水平。

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分别会对人的精神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孟德斯鸠认为,瘠瘠的土地能够孕育人的进取精神,而肥沃的土地则养成了人的惰性心理。“土地瘠薄能使人勤勉持重,坚忍耐劳,勇敢善战;土地不肯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必须自己取得。”而“土地膏腴则因安乐而使人怠惰,而且贪生畏死。”¹⁷“一个国度土地肥沃,就很自然地养成一种依赖性。”¹⁸马克思也认为,“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¹⁹

毋庸置疑,地理环境虽然不是决定人的精神的唯一因素,但却是影响人的精神的重要因素。根据一种最朴素的观点,人是一个生物体。人的精神首先受制于人的身体,受制于人的“神经系统、营养和消化系统、能量”。这种观点,显然与主体论截然不同。在主体论那里,身体仅仅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主体论相信的是意识、灵魂、我思的决定功能,历史事件应该在这些方面,在主体方面寻找根源,历史的眼光总要穿透身体而抵达灵魂的深处。然而,如福柯的谱系学所表明的,身体是来源的处所,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历史上的冲突和对抗都铭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面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而人的身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物体,生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的。身体具有“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它首先需要的是营养和能量,而不是那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东西。因此,身体的需要是最本真的需要。人首先要解决吃穿住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的历史活动。当然,当土地可以满足身体吃穿住等基本需要的时候,身体也可能会倾向于怠惰,也可能“黏着于土地上”并形成与此相应的“安土意识”。但是,当土地不能满足身体吃穿住等基本需要的时候,身体便会突破任何坚固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萌生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对浙江人的精神状态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呢?如上所述,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分别会对人的精神产生不同的作用。在那些地广人稀或土地肥沃的地区,尽管人们可以获得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生活保障,但他们同时也可能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土地的束缚。也就是说,获得生活资料的保障可能是以牺牲自由流动为代价的。人们可能终年累月地去对付土地,从而像小孩子离不开引绳一样离不开土地,土地有可能耗尽那些地区大部分精壮劳动力的时间和精力。而在像浙江尤其是浙南这样人多地少的地区,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只要用很少的劳力,就足以对付土地了,因此土地难以束缚人。有人称,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的许多地区,是七★三八六★部队(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土地上劳作。这种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无可否定的是,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也的确使浙江大批的青壮年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可以既离土又离乡,外出从事工商活动。这一点在人口矛盾严重的温州,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温州市农村劳动力为 180 万人,其中从事种植农业的为 160 万人;而在 1985 年的 210 万劳动力中,务农的只有 60 万人,占 28.8%,其余 150 万农民从农田上解脱了出来。因此,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既给浙江人造成了生存的压力,同时也给了浙江人从事非农业活动的自由空间。浙江人在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以后获得了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即自由流动、自由行动的自由,而这种人身的自由正是从事非农业活动尤其是

商业交往所不可缺的东西。这一点也与欧洲中世纪源自于流浪人的商人群体的经历非常相似。在欧洲中世纪,土地决定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上的生活资料分配,同时决定着—个人社会地位的—稳定。在把实物的获得看得比钱币重要的时代,无论贵族、庄园主还是农奴,都紧紧维系在土地的出产物上。所以,在当时脱离土地、失去土地便意味着失去赖以谋生的依据,也失去了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但也正是因为失去土地,使那些流浪人摆脱了以土地为基础的种种制度和规则的控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威尼斯人,他们都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人,都是脱离农业的人,都是基本上不与西欧的土地发生关系的人,都是到处流动进行交往,熟悉很多地方情况的人,都是善于面对种种危险而获取高额利润的人。西欧脱离农业的人同这些‘前辈们’有着太多的类似之处,同是处于社会夹缝中的人,他们最终沿着这些‘前辈们’的维持的道路,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生存资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²⁰

另一方面,浙江人尤其是浙江的农民,并不是天生就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具有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的。事实上,就常态而言,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正如费孝通所说,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²¹“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²²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人口是固定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

当然,农民“粘着在土地上”并不表明他们是非理性的,恰恰相反,农民也是相当理性的。他们似乎很“保守”,其实“保守”也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的选择。J.米格代尔指出:“农民奉行的是一种‘极小极大’战略,即冒最小的风险争取最大的对环境的控制。农民对变革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所谓进步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在还糟糕的地步。对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农民来讲,这是种无法承受的风险。”²³孟德拉斯则在《农民的终结》中引述了M.马利约特对恒河谷地农民的研究,马利约特发现那里的农民尽管意识到了一项完善的灌溉技术的好处,但他们却不愿用由此带来的水,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水渠是政府的一个阴谋,是为了从他们那里提取更多的劳动和金钱”。²⁴如果把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制因素排除在外,以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农业,一切都是确定的和透明的,或者说信息是充分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往往宁愿过着收入较低但相对稳定的生活。农民害怕尝试新鲜事物,主要是因为这种尝试常常带有某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小农是十分脆弱的,只要死—头牛,就足以让他陷入破产的境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守和不愿冒风险,永远是农民符合理性的一种选择。米格代尔引述克鲁克斯的话说,“过去,冬小麦—直被视为是有风险的作物,因为它完全依赖天气的好坏。但当税收沉重得使人们不堪承受,租金已高达50%甚至更高时,有少数比较富裕的农民就开始冒这种风险赌上—赌了。”²⁵与之相类似,当土地稀缺,尤其是像浙南—带人均只有半亩或0.3亩耕地,加之人民公社生产的低效率,因而农民难以活命时,“铤而走险”可能也是农民—种符合理性的选择。比如,改革开放以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就发生过群众到区机关食堂抢饭吃的事。外出逃荒的农民数量不易统计,据说,平阳县达60%。²⁶在这种情形下,农民离开土地就—种理性的选择或—种值得冒的风险。因为人多地少,意味着土地难以养活人,继续依赖土地就要冒可能饿死的风险;意味着浙江人尤其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中最鲜明地体现了浙江精神的浙南人(如温州人、台州人、义乌人、永康人)客观上必须离开土地,到非农领域谋生;意味着在最基本生存需要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为环境所迫,浙江人尤其是浙南人必然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

上述情况,无疑与生活于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东北地区的人们,形成了—种鲜明的对照。东北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经济的中心区域,而且也是—个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地区。比如,在有“黑土地之乡”称呼的黑龙江和吉林,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6亩和2.37亩。由于拥有广阔、肥沃的黑土地,人们不用太努力,就能够吃饱、穿暖。因此,东北人不是迫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轻易离开那富饶的黑土地的。几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的生活就很滋润了,何况有“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良好生存环境,让那些“死逼无奈闯关东”的后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与生俱来的依赖,固守在单调重复的故土上,缺乏陌生环境的压力和刺激,逐渐形成了—种缺乏开拓创新的保守品性,形成了—种墨守成规、缺乏应变能力的相当顽强的“安土意识”。诚如吉林学者邢正所说,“和浙江地区相比,我省在创新意识、发展意识、流动意识上有很明显的差距,而这明显差距的背后就是‘安土’意识在起作用。”

27 浙江不少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在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下远走他乡,在东北修鞋、修伞、修眼镜,弹棉花、卖小五金等获得的。而东北人不屑于此。结果是修鞋、弹棉花、卖小五金者和修鞋、弹棉花、卖小五金者的儿子成了老板,而享受者的人和他的儿子成了人家的打工仔。邴正认为,“安土”意识的形成有个过程,从历史上看,东北人的主体是关内移民,本来是有创新意识的,是流动的,是追求发展的。但东北地处内陆,资源丰富,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自然灾害少,关内移民来到这里很容易获取生活资料,靠山吃山,久而久之就使移民失去了早期的开拓精神。换句话说,“安土”意识的形成,是与东北相对优裕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东北是“地广人稀,空间压力小”,农民使用传统生产方式仍然能够生存下去。

但是,计划经济的边缘区域以及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等自然禀赋,使浙江人尤其是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的浙南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最本真的求生欲望,迫使他们必须离开土地,使他们必须“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使他们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这些构成了浙江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资源”。事实上,浙江一带早就因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而失去了那种安居乐业的条件,可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已非常尖锐,否则就不会有大批华侨飘洋过海去谋生计了。

三

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如东北)相比,浙南和浙北都属于人多地少的区域,但两者在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抗日战争以后,与浙北和苏南相比,浙南一带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据卓勇良的研究,28 浙江全省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清咸丰九年(1859),浙江人口 3040 万人,战争后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只有 1084 万人,减少了 64.3%。浙北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浙江人口减少最多的一个地区,从而导致这一带人均耕地较多。抗日战争时期,浙北地区人口又一次大幅减少。海宁县 1946 年有 30.6 万人,比 1936 年减少 6.1 万人。嘉善县一度是我方与日寇的拉锯区,1942 年嘉善县只剩 14.7 万人,比民国初年减少近一半。战争对浙江其他地区的人口增减影响相对较少,浙西南和浙西地区的人口,则基本未受战争影响。因此,浙南人多地少的程度,要远甚于浙北。现在,浙北的嘉善是浙江人均耕地最多的县。1979 年浙北的嘉兴地区人均耕地是温州地区的 2.15 倍,改革开放之初,嘉兴地区人均耕地为 1.12 亩,而浙南的温州地区则仅为 0.52 亩,不及嘉兴的一半。浙南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与浙北地区相比,生存压力更大。因此,浙南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表现出了比浙北人更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同时,浙北人地矛盾不像浙南那样突出,所以,历史传统是如苏南一样,“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29

由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浙北的农业形成了较多的积累,发展了社队企业和后来的乡镇集体企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浙北人像苏南人一样对乡镇集体企业的路径依赖或心理依赖。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与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小五金、补鞋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个体经济相比较,进入集体企业,毕竟能够带来更稳定的经济收入以及更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浙北人像苏南人一样,没有离开土地的迫切性,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进入乡镇集体企业从事工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贴补家用,是作为农业活动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与此形成对照,在人地矛盾更加紧张的浙南地区,农业未形成太多的积累,集体经济十分薄弱,浙南人不可能更多地依赖于社队企业或集体企业,而只能靠自己;另一方面,土地甚至难以解决浙南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因此他们必须脱离土地或离土又离乡,才能求得生存。

事实上,在浙南一带因为人地关系一直高度紧张,民众长期以来就有外出谋生的习惯,外出人口在总人口中常常占有相当的比例。据周晓虹对苏南周庄和浙南虹桥的比较研究,在民国时期,“周庄因为耕作条件相对较好,外出的农民总的来说比率不大”,而人地关系紧张的“虹桥农民的离村率就要高于人地关系相对松弛的周庄,这种现象在遭受灾荒时尤为明显。”30 比如,民国 18 年(1929)年虹桥一带遭灾时,“一月以来,逃荒外省外县者,相属于道,一时难于调查,实不知几千万人矣。其居者食甘薯之叶,食田草俗名蟹壳、连泉等,已数见不鲜,服毒投河以求一死者,复屡有所闻。”31 由于土地缺乏,到 1949 年时虹桥一带就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兼营小商业或小手工业。虽然其中多数商贩本小利薄,但他们的商业意识却相当浓厚。虹桥现象可以被看作浙江尤其是浙南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一个缩影。

1949年以后,由于人口的急速膨胀,加之人民公社生产的低效率,浙江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所以浙江人自主谋生的意愿自然就更加强烈。在极左的政策高压下,因人地紧张而外出从事弹棉花、做木工、打金、挑糖担以及随地设摊、沿街叫卖等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活动,可以说是屡禁不绝。比如,义乌面积1100余平方公里,人口63万,人均耕地面积0.56亩。再加上土地贫瘠,20世纪60、70年代,农民人均年分配收入一直徘徊在60元左右,是典型的“高产穷县”。20世纪70年代,义乌县农业劳动力共有20余万,而耕地只有38万亩,即使使用最落后的生产工具,也存在十几万的剩余劳动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治挂帅”、“大批判开路”的宏观政治气氛下,义乌已存在混迹于定期集贸市场的地下小百货批发市场。“每逢市日,廿三里镇集贸市场上出现了众多的提篮叫卖的小商品专业商贩,紧接着,稠城的闹市处县前街也出现了几十个专卖小商品的摊贩,这些人以竹篮、箩筐、旅行袋、塑料布为工具,随地设摊,沿街叫卖。日初设摊,日中收摊。”³²在当时,专门从事小百货交易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义乌的商贩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还要装备简单,便于逃跑。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义乌,在浙江的很多地方都存在过。更有甚者,在20世纪70年代因农业学大寨而对外出农民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民为了谋生,甚至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从事个体经济。在温州虹桥镇的档案室里至今还藏有大批六七十年代由乐清县有关部门签发的处理决定,被处理者有倒卖粮票的,有倒卖金器和银器的,从事这些活动的甚至不乏党员、基层干部和复员军人。³³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位和人多地少,给浙江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所以当政策松动以后,浙江会是如何一番景象,人们便可以想见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一村一品”、“一方一业”的形成,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的创新,各类专业市场的培育,自筹资金建设城镇(“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是典型代表)的路子,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旧城改造资金自我平衡,通过股份制创办大学(如温州大学)的探索,“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的“四自”办交通的路子,以及在水利建设领域推行“五自”政策(比前述“四自”多一个“自行管理”),乃至于浙江台州等地乡村自发出现的民主恳谈会等等,莫不是浙江人运用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精神这种“历史传统”和“精神资源”的结果。浙江经济呈现区域多样化,诸如宁波服装、温州皮鞋、绍兴化纤面料、海宁皮衣、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乐清低压电器、东阳磁性材料、黄岩精细化工、庆元香菇、新昌名茶和制药、安吉竹产品等等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可以列出很多。这种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的形成,如果离开了计划经济边缘以及人多地少环境下萌生的浙江各地人民群众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便是不可想象的。

注释:

① J. R. S. Philips, *The Medieval Expansio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

② Canter, Norman F. And Werthman Machaels, *Medieval Society 400-1450*, N. Y. Thomas Y. Crowell Co., 1972, p. 139.

③ 吴日法:《徽州便览·缘起》。

④ 唐顺之:《程少君行状》,《唐荆川文集》,卷一五。

⑤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⑦ 许承尧:《歙事闲谈》,第六册,《明季县中运米情形》。

⑧ 万历《歙志·货殖》。

-
- ⑨徐松荣：《近代时期的山西农业》，载《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⑩《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三，任启运《请安流民兴水利疏》。
- 11 朱轼：《朱文端公文集》补编卷四，《咨户兵二部河南巡抚禁遏余》。
- 12 康基田：《晋乘菟略》。
- 13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9 页。
- 14 民国《太谷县志》卷三。
- 15 民国《太谷县志》序。
- 16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 页。
- 17 18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56、54 页。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61 页。
- 20 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1 页。
- 21 2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4、3 页。
- 23 25(美)J.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 43、43 页。
- 24(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2 页。
- 26 29 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载《纵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27 郅正：《走出“安土”意识 推动全民创业》，《吉林日报》2004 年 6 月 4 日。
- 28 卓勇良：《番薯、战争与企业家精神——也谈温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 30 33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20 和 121、196 页。
- 31 《灾荒最近消息》，《乐清导报》第 69 号，1929 年 10 月 29 日。
- 32 张文学、朱恒兴：《义乌小商品市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义乌的实践》，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 页。